



北大校报导读



北大校报微信

■ 校报记者 李慧宁 王璞

燕园新秀

苗润博: 相比学者, 我更看重老师的身份

暖阳透过斑驳的树叶洒落路面, 沿着未名湖畔的小径一路向前, 记者来到红楼灰瓦的朗润园西所——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办公驻地。一入庭院, 静谧清幽, 甬道的对面便是苗润博老师的办公室。三面书架, 四部灿烂, 中间是苗老师的书桌, 上面放着厚厚一摞史学方面的文献。“我正在备课”, 苗润博老师微笑着说。

爽朗、真实、不拘一格, 这是苗润博留给记者的最大印象, 一杯热茶, 几张座椅, 就足够畅聊一整个上午。他身上外化着的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热情, 与这座庭院的沉静互相交融。随着访谈的徐徐展开, “却顾所来径”, 一位学者的成长与思考已然呈现出翠微之色。

“我真切地感受到, 天上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中学时确立了对历史学的兴趣, 本科期间就得到名师青睐并顺利拜入门下, 成为中国辽金史大家刘浦江先生“临终托孤”的得意弟子, 毕业后留校任教, 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85后”优秀青年教师。如果只把这些高光的瞬间勾连起来, 苗润博走过的路显得十分平稳顺畅。然而, 当被问到是如何走上历史学研究的道路时, 他思考再三后回答道: “我不典型、不足为训, 好像有点天生‘反骨’。”

苗润博出生于河北省张北县, 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坝上草原, 是辽金捺钵重地, 也是元朝中都的所在。不同文化长时间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家乡历史的基调。“为何会有胡汉之别?” “不同的人群彼此如何看待对方?” 这类问题也成为他最初对宋辽金元史产生兴趣的起点。

中学时代的苗润博学习成绩优异, 却也不蹈常。看似斩截实则模糊矛盾的历史课本常让苗润博感到困惑, “自古以来”“只有……才能……”的叙述给他带来一种无所遁形的被支配感, 每每忍不住向老师提问, 得到的回答却是: “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中学阶段能够回答的, 如果愿意, 你可以去读历史学的研究生。”怀揣“真正的历史和历史学是什么模样”的懵懂疑问, 苗润博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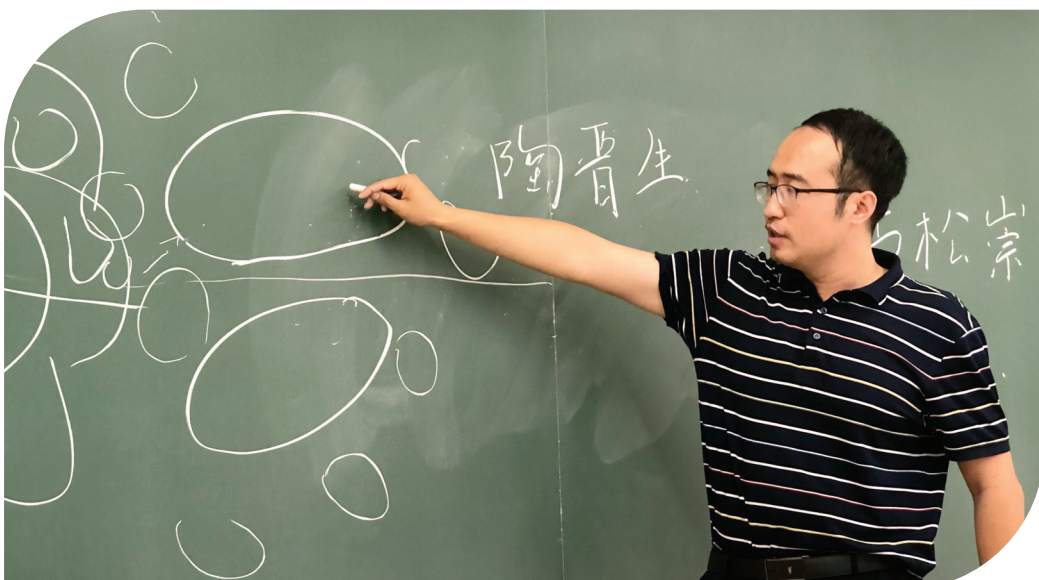
上大学后的苗润博也并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好”学生, 他为自己找到的学习节奏是读书尽量广泛, 上课尽量精简。在实际操作中, 教室往往让位于图书馆, 翘课是家常便饭, 系统性的自主阅读逐渐成了他每天坚持的习惯。阅读的范围除了历史学的专业书籍外, 还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 从中得到的滋养构成了他后来十数载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底色。而对于少数“看对眼”的课程, 苗润博则给自己定下硬任务: 每次课后争取能向老师提问, 最好能挑出一处课程内容的批漏。大一下学期的“中国古代后期史”课上, 他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王晓欣老师。王老师研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 不仅在专业方向上对苗润博影响很深, 更让他早早就将是否会做实实在在的考证树立为检验史学是否入门的标尺, 这一观念至今未改。

刚上大三时, 苗润博从天津来到北大, 旁听了一次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课后他借提问之机自报家门, 并指出刘老师的论著《松漠之间》中用过的一则史料存在问题。年少的苗润博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他只是故作镇定地与老师“侃侃而谈”了半小时, 随后又在地坛书市上逛了一圈才乘车回到天津。第二天, 复归南开日常的苗润博想起给刘浦江老师发邮件致谢, 没承想刘老师回他的开篇第一句就是: “我一整天都在找你。”

就这样, 苗润博被允许每周来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加刘浦江为研究生开设的“《辽史》读书课”, 并在后来顺利保研, 成为刘老师的入室弟子。2022年是中古史中心成立40周年, 师门大师兄在纪念文章里重提了这段“进京赐馆”的佳话。也正是在这个阶段, 苗润博接受了刘老师严谨、系统的学术训练, 在宋辽金史基础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得到学术共同体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 苗润博刚上博一时, 刘浦江老师不幸罹患重疾而辞世。在病榻前与同事们道别时, 刘老师最郑重的一嘱托,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日后必定超过我, 一定要把他留住”。



苗润博



苗润博讲解辽金时代的地区格局

这是无上的荣誉, 也是巨大的压力和鞭策。从2015年1月刘浦江老师去世, 到2020年8月苗润博正式入职北大历史学系, 五年半的时间里, 他仿佛提前被放在了聚光灯下。从“进京赐馆”到“临终托孤”, 再到留校任教, 旁人或许可以轻松地勾勒出一条看似自然的叙述链条, 但实际过程中经受了怎样的考验和重压, 只有他自己知道。2018年2月下旬, 距离博士论文匿名评审仅剩两个月, 苗润博统计了电脑中成型过的文稿, 仅有五万字, 按常理只能申请延期, 但他硬生生在送审前又赶出了二十万字, 顺利毕业并获评当年的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当被问及是什么支撑了那最煎熬、最困难的“炼狱”生活时, 他深情地回答: “我真切地感受到, 天上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用一流的科研成果 为一流的教学服务”

苗润博现担任历史学系2021级本科生班主任, 他格外在意这个头衔。在他看来, 大学教员一身二任, 但首先是一名老师, 然后才是一名学者。当班主任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和学生一对一、面对面聊天超过100个小时, 他想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学生们理解大学是什么, 知道北大历史学系最希望传承的东西是什么。入职不到三年, 他主动开设六门新课, 备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这些课程很多都是刘浦江老师曾经开过而后中断多年的, 例如“中国史学史”“《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辽史研读”“辽金史研究”等等。

在苗润博眼中, “北大老师最大的幸运同时也是最大的责任在于, 可以用最一流的科研成果来为最一流的教学服务”。历史学系2022级硕士生孙润泽担任了苗润博秋季学期“中国史学史”课程助教, 开学前一个月苗润博就主动找到他, 讨论课程大纲与作业安排。每节课后, 孙润泽都会按照苗润博的要求, 收集大家的听课感受和意见建议。孙润泽说, “苗老师的情绪与工作重心几乎全围绕这门课展开”。备课时, 苗润博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争取每节课至少有一处言人所未言, 解决一个未曾解决的学术问题。”课上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将新想法袒露给学生, 并直言“这个问题以前是笔糊涂账, 我昨晚备课时刚刚搞明白”。如果哪一堂课没有找到“爆点”, 前一天他会整晚睡不着, 下课后也忽忽有所失。在他看来, 每一堂课都是独一无二的情境, 此时此刻地无法重新来过, 因而不想留下遗憾。在讲司马迁《史记》一节后, 北大树洞上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一生所凭唯史笔, 千载谁堪作谤书! 苗润博老师的中国史学史, 可以说唤起了我沉寂已久的关于史学的浪漫想象与激情。”

一次课上讲到了辽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四时捺钵制”。介绍完基础史料与前人成果后, 苗润博停了下来, 大声提问: “这里面是否存在问题?” 同学们面面相觑, 不知苗老师所指为何。“这里

面有一个根性的问题, 契丹人是否天生就具备四季观念? 是否一定会按照这种农耕社会的节奏来安排生产生活?” 通过史源学的追溯, 对《辽史》中“权威”记载的拆解, 苗老师发现这一制度的叙述框架来源于一个从辽朝跑到宋朝的汉人的记录, 后来为元朝末年修《辽史》的史官所承袭, 后世学者因为文化滤镜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套汉人的叙述逻辑, 却忽略了游牧者的世界通常只有冷暖两季以及与此相应的迁徙节律。用定居的思维去理解游牧, 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当时, 大概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误区与偏见。“反思人类的思维局限, 推展人类思考的边界, 正是历史学最核心的旨趣。”苗润博说。

原本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与“辽金史专题”, 却常常吸引一众旁听的研究生。“苗老师的课会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眼前一亮的感觉!” 来自中文系的博士生卢多果回忆起自己多次被震撼的经历, 不无感慨地说, “能够听懂苗老师的课是一种幸运, 每堂课都有发覆的感觉”。

如果说课堂上是教师与几十位同学的互动, 那么在苗润博的办公室, 则更多是一对一的交心。“这间办公室, 就是当年刘浦江老师的办公室。系里安排给我, 我明白老师们的深意。”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诞生过程。那是十年前的冬天, 北京下着鹅毛大雪, 刘浦江老师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从家中赶到办公室, 手把手带着他从篇章结构、引用规范、专业表述等各个方面逐字讲解、修改,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整整连续五天。“有一次, 刘老师还在路途中的雪地里摔了一跤。”说到这里, 苗润博一时语塞。

“刘老师怎么教我, 我就怎么教我的学生。”苗润博如是说。当年上大三的孙润泽的一篇习作, 前后被苗老师足改了13稿才过关。“回忆起每次在苗老师办公室, 从午休到晚饭长谈四小时的情况, 真是紧张而又充实。”孙润泽感慨, 历史学方法有些可以像师傅带徒弟那样, 手把手地教, 实实在在地传递, 示人以轨辙, 授人以渔, 然而苗润博深知, 精神需要传承, 但是不能完全复刻。“老师的责任在于将历史学方法可视化、路径化, 这是第一层。再往下就要看个人的天分、关怀和思想了。”

“以身体之, 耳鬓厮磨”

苗润博曾经有一次意外“出圈”, 是在2021年9月。他以本科新生班主任的身份, 在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历史学人的价值坐标》的致辞。这篇文稿不仅在历史学系学生的朋友圈里广为传播, 还被《北京青年报》等公共媒体转载。

苗润博从小喜欢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以至于如今的他常以侦探工作来类比历史研究。在寻常人眼中, 历史是写好了的, 要被记住、被接受的。但在他看来, 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待检验的, 好的历史学家更像是一名侦探, 从“犯罪现场”尽可能还原真相, 这也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意义。因此他的课程非常注重

实操。苗润博的课极少设置论文写作, 比如“中国史学史”期中考核有一项叫“修史实践”, 由他指定《明史》中没有传记的若干人物, 让学生分组合作, 设立微型“史局”, 选择其中一位立传。苗润博希望通过这种别开生面的学术训练, 让同学们体会古人修史的真实情境, 对于史书的生成过程有具体而切实的理解。该课程另一项考核是“论文批评”, 要求学生从历史学最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中选取一篇论文, 逐条检核引文、出处是否正确, 论点与论据之间是否互相支持。这项训练传承自刘浦江老师, 旨在引导学生揣摩学术规范的同时, 树立敢于批判、挑战既有权威的理念和方法。“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 关键在于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重构。”苗润博说。

“以身体之, 耳鬓厮磨”是苗润博在参加历史学系研究生会举办的教师茶座后留下的寄语。2021级历史学系本科生王姣回忆道, 第一次去苗老师的office hour, 就被一句“跟着课程要求读二手论著, 在我看来不能算真正的读书”给镇住了。“功利性阅读从来都是碎片化的, 可以应付课程, 却难以履志忘学

之心。自主性阅读, 特别是系统性地阅读原典, 才是真正的读书。”在苗老师看来, 学生是否真正对学问有感觉, 是通过与原始资料、古典文献耳鬓厮磨中慢慢磨出来的, 学术的根基、养分与门槛、路径都蕴含其中, 惟有以身体之, 方可能将其内化为自己永久的精神资源。

苗润博有课和学生一起吃饭的习惯, 在他看来, 这是与同学们深入接触的好机会。一次“辽金史专题”课后, 他与两位选课学生同桌吃饭, 两人同为历史学系大三学生, 却互不认识, 问及原因, 答曰: “我们一个研究宋史, 一个研究元史……”这件事对苗润博触动很大, 过早、过细的断代意识成了学生们力争上游、抢占内卷阵地的手段, 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他希望能让同学们尽量跳出断代史的畛域, 从更大的视野去思考问题。“断代研究可以呈现历史的剖面, 训练学生深入历史的感知和技能, 但如果缺乏贯通的关照, 一头扎进断代里, 很难做出大学问。”苗润博说道。在“《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上, 他鼓励同学们选择自己不熟悉的文献去做课堂展示, 引导他们在长时段的脉络中观察文献本身的义例

全球治理 强国新征程

知识权力与全球治理

· 陈一峰

全球治理是冷战以后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全球治理被认为是没有政府的治理, 是在全球、国际和跨国空间内多元主体参与, 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导向, 生成世界秩序的政治社会过程。全球治理以功能主义为基本理念, 强调全球问题的有效规制, 因此全球治理表现为一个持续的治理进程, 有序化进程。

一、以专家治理为核心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官僚问题, 是一个通过科技、理性、专家等技术方案来替代政治的治理路径, 致力于没有世界政府下的技术官僚治理。全球治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特定的国际问题以技术问题和专业事务的形式呈现, 从而从政治中剥离出来, 通过专家决策来回避国家间政治。

全球治理的突出特点是去政治化、理性化和专业化。专家决策往往表现为技术性、客观性、不可选择性。例如, 在气候变化领域, 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左右来自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性是以国家良好经济运行的模式为底层逻辑, 背

后恰恰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知识基础。在互联网领域治理, 网络底层协议对于互联网的中立性、普遍性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全球治理很多时候表现为专家治理, 依托专业知识治理, 去政治化的治理。

专家和专业人士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要素。形式上客观、科学、普遍、中立的专业知识, 构建着新的国际权力和统治领域。而专家政治和知识政治也因此正在成为新的全球政治场域。在新时期, 我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对于国际机制的政治参与, 而必须深入各专业领域, 依托国际机构进行新知识的生产和流通, 并以此提出新的治理方案。大学是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 大学的知识生产应当为我国未来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二、全球治理中的知识权力

国际组织充当着国际社会组织化的载体, 是全球治理的工具、场所和主要参与者。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奈特(Michael Barnett)和玛莎·费丽英(Martha Finnemore)曾经提出, 国际组织享有四种权威: 法律-理性权威、授权权威、道德权威、专业权威。从政治学的研究

及学术风气、历史情境的流变。“研究者处理的个案, 不应成为自我设限的藩篱, 而应该关注它在多大程度上照亮、推展了整个人类思考的边界。”

“起初, 我们总是害怕自己没办法达到苗老师的要求。接触久了, 才发觉苗老师很可爱。”王姣说, 课堂上, 他很严肃, 会结合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直接向学生犀利发问, 不留一丝“情面”; 课堂下, 他活络有趣, 和学生一起聊旅行, 聊运动, 聊美食, 还会谈起妻子是自己初恋的美好。师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以后, 同学们发现, 历史学的精义不仅藏在典籍著作里, 也在老师的言谈举止之中。一次, 苗润博带领本科班上的几位同学到河南濮阳开展社会实践。站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回銮碑前, 苗润博手指残碑, 眼神一下明亮起来, 生动地再现出宋仁宗立碑前后的种种历史场景。王姣边听边抬起头, 看到碑上的“群胡”二字时, “仿佛能想象到契丹使臣经过此碑时的心境”。苗润博对历史学最纯粹的热情感染着学生, 让更多人相信, 在这个谈论关怀都显得奢侈乃至奇怪的社会里, 人们依然可以去触碰人文的魅力。

“北大培养的不是优秀、精致的工匠, 而是具有深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的学人。”苗润博说, 教学的一方面是专业训练, 另一方面是人文关怀, 他希望学生们如同骑自行车一般, 用两个脚蹬子骑行, 这样才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扎实、走得更远。

行至今日, 如果让苗润博从自己过去的求学、教学经历里选取几幕最珍贵的瞬间, 有一幕一定能够上榜。那就是当他站在讲台上, 台下是一群充满朝气的脸庞, 在他讲到激动处, 捕捉到学生眼中闪烁着兴奋亮光的画面。当苗润博理想的课堂爆点、新鲜出炉的头脑风暴呈现在教学中, 呈现在与学生的交流里, 在相互感召中产生碰撞、激起波澜时, 他会格外心满意足。孙润泽说, “苗老师偶尔会跟我们讲, 他不是‘不求回报’, 他恰恰热切地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反馈”。

未来, 苗润博想开一门全校通选课, 名字就叫“史学通识”。“我想多做一点,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理解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去发现历史学的现实关怀究竟在哪儿。”在他看来, 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学问题的起点一定是对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的关心, 而终点又必须是超越地域、超越古今、具有恒久价值的。在做一名好老师, 影响一个又一个鲜活个体的过程中, 他也在拥抱更为广大的世界。

来看, 成员国授权仅仅是国际组织权力来源之一。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是多元、复合、自我强化的。在上述权力来源中, 国际组织基于专业知识所享有的权力值得高度重视。

知识权力的生成有赖于专业认知共同体。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哈斯(Peter Haas)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认知共同体的概念。认知共同体是指在特定领域具备公认的专业和能力, 并在该领域范围内对决策所需知识具有权威影响的专业人士网络。而正是专业人士所共享的规范、原则、因果论证、方案对策, 决定了特定的专业问题应当如何被定性、分析和处理。认知共同体是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跨学术、政府、国际组织和大型企业等社会部门的政策制定共同体。

专业知识决定着全球治理的认识论框架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全球问题的识别、设定、解决方案都日益依赖于专业知识的生产 and 介入。专业知识对于全球治理的塑造, 不仅仅在于提供可接受的全球治理方案, 更重要的是首先定位了何谓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依赖于专业知识的话语机制来实现, 专业知识提供 (下转第2版)



语言的复杂适应性

——我能不能感谢您的聆听?

·汪锋

毕业季即将来临,同学们又要开始准备答辩所用的PPT(课件)了。按照惯例及为了向在座专家、老师表达感谢之情,很多同学都会在PPT的最后一页写一句“感谢各位专家聆听!”。那么这样写正确吗?

其实,“感谢聆听”这个说法已经困扰大家好几年了,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都有好几篇了(刘娜,《如何使用“聆听”和“听取”》,《赤峰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汪维辉,《口罩可以“佩戴”吗?》,《语言文字周报》,2022年;王晖、张芯萍,《“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及其产生动因》,《德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38卷第3期;周志锋、李仲慧,《“聆听”的语义和语用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归纳一下,认为“感谢聆听”不合适的理由主要在于其不得体,“聆听”是敬词,但用了它应该表示谦逊的语境中;觉得可以接受“感谢聆听”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书面语体上的“词汇缺位”,按照书面语体上的要求,“感谢”后面需要找一个双音节的听义词,二是“聆听”的语义就是仔细听,并没有格外尊敬讲者的意义,其尊敬讲者的色彩是语境带来的。

所以,双方根本的矛盾其实在于“感谢聆听”这个说法中,“聆听”是否带有尊敬讲者的语义。如果是,显然就不合适,因为演讲者再托大,按照社交礼仪,也不能强行让听者尊敬自己;如果不是,自然就没有问题

为了在这个冲突中获得更强的支持,人们纷纷追根溯源,大多都会追到《说文》,发现“聆”和“听”在古时候是同义并列的,“聆”有仔细听的语义侧重。“仔细听”这样的事件更多的是发生在对尊者的聆听这样的语境中,因此,“聆听”就会沾染上尊敬讲者的色彩。这样的演变故事在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比比皆是。但要注意到的是,其不含尊敬讲者色彩的用法也仍然很常见,比如聆听音乐、聆听大自然等等。学者们还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检索,试图给出更为客观的证据,而不仅仅依赖个人的语感。基本的分析都是倾向于所听为人的讲话时带有尊敬之意,其他则并无此意;大致上,前者的使用频率是后者的两倍。(周志锋、李仲慧,《“聆听”的语义和语用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感谢聆听”这样

的用法最近几年才出现,而且基本仅限于在PPT演示的最后致谢页面。以我个人的经验,2000年前,我读研究生开始,计算机课上就有PPT,但由于投影等相应的设备有限,我在2001年硕士答辩时完全是口头报告,但一到香港攻读博士时,上课及讲座鲜有不用PPT演示的。三年后,回到北大,PPT演示也非常普及了,不过,一直没有见过“感谢聆听”,只到最近四五年,遇见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感觉,一种新的语体正在形成,这种语体介于书面语与口语之间,在PPT演示中,书面语(PPT页面)和口语(口头讲述)一起呈现,互为补充,通常是一个讲者面对多个听众;最常见的场景是期待讨论互动的报告;可以说,PPT演示正在建立一种平等沟通的新型关系,比如,学生在课堂上做报告时,不仅面对老师,还有自己的同学;学者在会议上做报告时,不仅面对前辈,还有自己的同辈和学生辈;业务经理在做产品规划时,不仅在向上级主管陈述,还有自己的

同僚和下属。或许,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PPT演示语体,“感谢聆听”应运而生,首先从学生做的课堂报告中生发出来,因此前所用的“谢谢”一方面过于口语,另一方面过于笼统简略,显得不够正式与真诚。电视结束时用“谢谢观看”,广播结束时用“谢谢收听”,以此类推,在PPT页面上写上感谢的内容,就更为得体。根据现代汉语韵律上的要求,“感谢”这样的说法非常别扭,需要为“听”找一个双音节的词,如此,可供选择的有“聆听”“倾听”和“垂听”,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三者的频次分别为1941次,3828次,59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聆听(书)听;凝神;~、~教诲”,“倾听 细心地听取(多用于上对下);~群众意见”,“垂听”没有列为词条,与之相关的是“垂”的解释:“(书)敬辞,用于别人(多指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念,~询,~问。”再仔细检查语料

库中的用例,“垂听”均出自《圣经故事》,仅用于上帝对子民的垂听,这大概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临时造词现象。假定一个学生在做PPT最后的致谢页面,“垂听”由于其过于罕见,大概率不会出现在选择项中,“聆听”比“倾听”更适合书面及正式语体,而且“倾听”过于强调听者的“尊长”,与演示语体中追求的平等尊重有所抵触,甚至显得略微做作。但问题是,“聆听”附带的听者对言者的尊重义似乎与交际的礼貌原则冲突,也是前文提到的毕业生在答辩时“感谢各位专家聆听”受到批评的原因。中国有句古语,“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显然,在毕业答辩这样的场合,毕业生们无意冒犯各位专家评委,由于此处“聆听”并没有带宾语,其意义更为抽象,而没有带上不同宾语的的实际分化(聆听人的话语时,不仅表示仔细听,还有对言者的尊重;聆听其他声音时,仅有原初的仔细听之意),也就是,此处“聆听”意为“仔细听”,甚

至泛化为“听”。有学者提到台湾学者早已将“聆听”泛化为“听”了(汪维辉,《口罩可以“佩戴”吗?》,《语言文字周报》,2022年),我找台湾同事确认,她认为确实如此,并没有额外的对言者的尊重之意。我猜想,在这里“感谢”二字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也就是,感谢之意的先导压制了由于常与“教诲”等连用造成的“聆听”对言者的尊重之意。不过,也得承认有不少听众,由于频率效应,看到“聆听”就会想到“聆听教诲”一类,从而激活对言者的尊重之意,尤其是在意其地位实际上比言者高时,会感觉受到了冒犯,进而会反对这种用法,其公开批评会抑制“感谢聆听”的进一步扩散。据说,有专家对一位优秀青年学者使用“感谢聆听”很不悦,认为就凭这个就不把票投给他。(周志锋、李仲慧,《“聆听”的语义和语用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语言作为一种实际行动,其用法的创新与扩散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博弈,双方各自的考虑不尽相同,就导致了语言运用上的变化。该创新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就会赢得一席之地,否则,就可能昙花一现,被淘汰出局。“感谢聆听”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人中似乎已经站稳了脚跟,但能否全面铺开仍然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

知识权力与全球治理

(上接第1版) 了全球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框架,为机构的政策实践提供基础性基础,同时也限定了论证和辩论的话语体系。

知识权力对全球治理的运行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第一,相比投权力,知识权力加强了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际组织的独立性不再基于国际法律人格,或者国际公务员的中立,更是基于其专业知识体系,这使得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成员国保持政治距离。成员国通过增加投票权或者施加政治影响来干预国际组织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第二,知识权力使得参与全球治理的专门门槛提高。专业人才日益成为国际组织政策与治理的核心团队。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专家治理,非专业人士往往很难对专家的专业决定发起挑战。第三,国际组织的专业知识与欧美国家的主流学科知识高度耦合,强化了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支配地位。全球治理的竞争已经从方案竞争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专业知识体系和学术影响力的竞争,这也使得对现有全球治理秩序的挑战必须要进入专业内部来展开。

三、知识与霸权治理
全球治理是一个世界秩序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世界被重构为治理者和被治理之间的关系。治理者是掌握了专业知识、全球动员能力、决策权力的组织和个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了治理的对象,而专业官僚获得了治理问题的发言权。全球治理过程作为一个追求善治的过程,持续不断地生产着治理知识和权力关系。全球治理既是一个有关权力、财富和话语权的全球分配机制,也是一个关于全球治理、自我身份、与他者关系等意象的主观塑造过程。

全球治理下的知识生产,本身是一个政治选择过程。只有特定的专业知识才能进入全球治理体系。首先,全球治理的知识必须为国际组织官僚提供充分的治理工具,便于组织干预国际问题、扩张影响力。相关专业需要具有技术可行性,能够将其识别的全球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问题。大量的全球问

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者相关技术,而无法或者不会被纳入全球治理的范围,而被视为自然现象(例如深海地震)。其次,全球治理的知识不在于终局性的解决问题,而在于能够长期或者永久的管理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环境、保护人权、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都是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性治理使得相关国际组织和专业人士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合法性。

知识权力兼具精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性质。什么是科学、理性的专业知识,哪些是有效、可行的治理方案,往往又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价值偏好和立场。以形式上中立、科学、专业的知识来进行治理,回避全球治理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往往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全球治理的必要成本和附带性损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要求之下,各借款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国内经济改革方案,往往造成国内工人失业、社会公共服务急剧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寡头化等不良现象。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损害都被“合法”地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图景之下,因此知识权力的暗影下隐藏的往往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下的无法发声的国家、群体和个人。

四、知识创新与全球治理变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战争、恐怖主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经济民族主义等问题此起彼伏,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弱。我国也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致力于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形式上扩大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出资额和投票权,甚至也不能满足于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内中国籍官员数量的增长。在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权、话语权的基础上,中国应当高度关注国际组织的知识权力体系进行变革。这不仅仅需要中国培养大量的国际组织基层公务员,而且应当致力于在专业知识的

产出方面输出有竞争性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并进而转化为国际组织的专业知识话语。

要改革国际组织的权力运行,最核心的是改革国际组织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要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进入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领域的政治。通过深入学科内部,发掘现有专业知识本身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选择性,揭露现有知识体系所遮蔽的偏见和偏见,探索和发展竞争性的知识方案和理论体系,是在微观层面对全球治理问题开展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以发展问题为例,何为发展以及何为可行的发展路径的知识竞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方式。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如果可以上升为发展问题的一般知识,显然将为全球发展和消除贫困问题提供新的治理知识和政策路径。

在全球治理背景之下,我国的大学也承担着特殊的重要使命。大学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在发展中国更是如此。全球治理的国际竞争,最后往往落实为全球治理的知识竞争、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通过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创造新的理论、概念和知识体系,打破全球治理中现有知识体系的垄断,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因此打破现有学科知识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以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本底色的学科知识体系,不仅仅在国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全球治理中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也将是我国人文社科学界所面临的长期任务。

在知识创新的同时,加强国际组织的民主性,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发展中国家对相关问题的参与,加强国际组织的民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变革国际组织的知识权力的运行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将全球治理从技术治理适度回归国际民主治理,才是全球治理行稳致远之道。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世界迎来经济秩序重建新时代,中国正走向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心。中国作为主办国的G20杭州峰会,在中国理念与世界关切之间,搭起一座座新的沟通之桥。图为G20杭州峰会会议中心。

弱,这与我国农业对全球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极不相称。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总体比较落后,农业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的程度还非常低。因此,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着力点,一方面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科技推广效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和农地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深刻变革,从而为农业科技进步奠定体制基础,彻底改变我国传统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方式。

2023年“一号文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提出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支持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观测实验站(点)建设,同时强调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

我认为,要实现中央一直强调的“藏粮于技”,就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大农业的科技引领力度,加大农业技术人员的资金投入和对技术创新人员的激励。农业技术进步往往具有高投入的特点,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巨额投资,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师从战略高度对农业科技进行重要性认识的深刻认识,我们是不可能对农业科技进步有所作为的。比如在农机领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生产加工的各产业链对农机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如果长期没有持续的巨额资金投入,如果没有长期的农机领域的科技创新,要想在农机领域占据优势竞争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支撑和鼓励农业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要从完善和改革技术管理体制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入手,使技术人员能够获得更大的内在激励从事农业技术创新。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以利益连结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优势互补为导向,构建农业科技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国家级科研机构等的科研力量进行整合,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效率。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建设农业强国,要重视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从良种的研发到生产环节的生物技术的应用,从化肥农药的研发与供应到整个农资体系的生产和供给

体系的完善,从新型农业生产设施的研发到农业机械创新、从农业组织体系的升级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业管理体制的创新,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上,都要注重产业的融合和整合,以构建新型的农业业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互联网支持下,农业电子商务、农业旅游文化、农业体验式营销和推广等新型业态会不断出现,一些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农业平台将颠覆以往农业产业的传统形态。要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全产业链上打造一个现代化农业产业集群,每个环节既突出产业优势,又兼顾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衔接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强强联合和产业融合。

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还要特别重视生态农业建设,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把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与保障生态安全置于同样的高度。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推进水肥一体化,建立健全秸秆、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体系,同时要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农用地土壤修复等重金属污染防治,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当前耕地污染问题严重,我们要注重借鉴我国古代土地用养结合的经验,注重古代的生态的模式加强土壤的养护和改良。要大力发掘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借鉴中国古代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的智慧,从而在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的同时,有效保障整个农业生态环境。

最后,还要发挥农业金融在建设农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为现代农业保驾护航。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增强我国在重要农产品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增强抵御国际农产品价格风险的能力。国家要在信贷融资、上市融资、股权投资等方面对现代化龙头企业和高科技农业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开发性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要对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大力支持。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和股份制银行体系也应该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现代农业企业的发展,在抵押担保等方面采取灵活的手段,用创新性的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的产业发展。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全方面的资本支持。要鼓励建立或参与建立国家级

两会笔谈

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

·王曙光

的农业产业基金和各省级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我曾经倡议国家建立主权级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以保障国家的农业安全,构建强有力的农业产业链,参与全球的农业市场竞争。

展望未来三十年,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将大为提高,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大为提高,一批优秀的、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化农业企业将在中国崛起。我国农业的形态也将转变为高效农业、高附加值农业,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将得到普及,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继承和复兴。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